

看世界

# 别了，列弗

新年伊始，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一家社区超市里，一位白发苍苍的顾客细细端详手中的购物小票，与收银员反复核对找零时收到的欧元硬币。在欧元正式启用后的头几个交易日子里，保加利亚国内随处可见类似场景——年轻的顾客往往随意一瞥，便把硬币囫圇扫进钱包里，扬长而去；年迈的顾客则会细心地确认、点数，那认真的模样仿佛不仅是为了适应新的支付方式，也是在与过往的支付习惯作最后的道别。

按照保加利亚政府规定，2026年1月1日至1月31日为原本市列弗与新本币欧元的“双流通过渡期”，两种货币在此期间均具有法定货币地位。购物者可以同时使用欧元和列弗进行支付，但商户只能以欧元找零。日常的现金交易因此出现了一种颇为特殊的“双币共存”状态：旧货币尚未完全退出，新货币已经全面进入。

随着保加利亚正式启用欧元，告别列弗的“倒计时”已经滴答作响。对外界而言，这是该国加入欧元区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但对保加利亚社会来说，这更像是一场静默的告别——告别一种货币，也告别一段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过往。

## 历史的印记

列弗的诞生，本身就带着鲜明的历史印记。



1880年6月4日，保加利亚公国通过《公国铸币权法》，正式将列弗定为官方货币。这不仅是一部技术性的货币立法，更代表了近代保加利亚国家主权构建的重要环节——在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保加利亚选择寓意“狮子”的列弗作为本国货币并非偶然：狮子既是民族精神的图腾，也是国家主权的视觉化表达。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列弗不仅承担着交换媒介的功能，也被赋予了国家独立与尊严的特殊含义。一方面，货币发行权本身就代表着货币制度与金融制度自主；另一方面，列弗的存在又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为保加利亚提供了一个清晰而独特的身份标识。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列弗都在保加利亚经济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稳定器角色。真正的动荡出现在冷战结束之后。20世纪90年代的剧烈通胀与制度转轨，使列弗的购买力迅速缩水，货币信用遭遇严峻挑战。家庭账本需要重新计算、价格标签被频繁更新，列弗从“稳定的象征”变成了“动荡的证明”。

此后，保加利亚引入货币局制度，列弗先后与德国马克、欧元紧密挂钩，以换取币值预期的稳定与国际市场的信任。从那时起，列弗的发行与定价机制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开始逐步趋近于联系汇率制度。

可以说，列弗的“一生”都与保加利亚的发展历程高度同频。它从民族国家的诞生中走来，最终在欧洲一体化的轨道上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 文明的传承

翻看不同时期的列弗纸币，几乎可以读出一部精简而清晰的保加利亚文明史。

纸币正面出现过革命者、文学家、启蒙思想家等一系列重要人物的形象，背景图案则涵盖手稿、历史遗迹与文化象征等国家记忆。这些选择并非纯粹的审美取舍，还记录了保加利亚的骄傲——那些值得被铭记的人与事，伴随着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成为保加利亚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欧元的启用并不意味着这些符号会全部消失，更准确地说，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

保加利亚版的分值欧元硬币（包括1分、2分、5分、10分、20分与50分），均印

着描绘勇士战胜野兽的岩石浮雕“马达拉骑士”（Madara Rider）。这幅浮雕创作于8世纪初，原作位于保加利亚东北部马达拉村附近的悬崖上，于197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保加利亚版1欧元硬币上则印着“里拉的圣约翰”的形象。作为一位长期隐居山林的苦行修士，里拉的圣约翰长期被视为保加利亚精神守护者。

保加利亚版2欧元硬币上的“主角”是帕伊西·希林达尔斯基，他是18世纪保加利亚民族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其所著的《斯拉夫保加利亚史》被誉为保加利亚民族精神的火种。硬币边缘刻有“天佑保加利亚”，这也是保加利亚在欧元统一货币体系内保留下的独特民族符号。

## 变更的喜悦

从经济学角度看，货币作为价值的尺度与交易的媒介，带有很强的工具属性。但在现实生活中，货币的意义却远超于此。

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在新年致辞中强调：“欧元的引入是保加利亚融入欧盟的最后一个里程碑——凭借我们千年文化的成就和我们国家对文明的贡献，我们理应获得这一地位。”在拉德夫的表述中，货币不仅是经济的血脉，还是文明的印记，其更替值得被提升到文明认同与历史承继的高度。

金融机构则更关注货币制度变革带来的现实影响。多数市场分析人士相信，统一货币制度有助于提升投资者信心、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运行提供更稳定、透明的外部环境。保加利亚DSK银行首席财务官兼执行董事、管理委员会成员茨韦托斯拉夫·迪莫夫表示，加入欧元区后，保加利亚最低准备金要求将从现行的12%降至1%，这将释放130亿至140亿列弗的额外流动性。流动性显著提升意味着金融机构“未必会有强烈的动机”提高利率水平，这将有助于增强全社会整体经济活力。

也有受访者持更加审慎的态度。就读于索非亚大学教育专业的安娜·赫里斯托娃对记者表示，更换货币并不会自动带来行政效率、工资水平或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只有在

□ 蔡 淳

制度和社会层面发生更深层次变革时，货币转换才会真正转化为发展动力。

此外，担忧价格上涨、通胀预期上升，以及在经济冲击面前缺乏灵活应对方法等声音也不绝于耳。

另有经济学家警告称，加入欧元区，意味着将本国货币政策的主导权交给欧洲中央银行；而保加利亚选择在欧元区经济前景尚不明朗、负债水平日益攀升的当下加入，“未见得是明智的选择”。

普通民众对于欧元取代列弗的反应也呈现出明显差异。

不少老年人仍然习惯用列弗计价。对他们而言，列弗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对于“初来乍到”的欧元，他们不熟悉，也算不明白。不少小商户在谈到价签变更、现金找零和会计处理的过渡成本时，也表示“很麻烦”。

年轻一代的态度则更为积极。尤其对于那些需要跨境学习、工作和旅行的人来说，单一货币意味着更少换算、更低交易成本和更强的流动性，欧元带来的便利完全可以覆盖心理上的失落。

无论各方观点如何，列弗的退场已成定局。然而，退场并不意味着彻底消失。未来的列弗将继续存在——存在于对价格的条件反射中，存在于旧纸币的收藏册里，或许也会长久存在于保加利亚人的记忆中。



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将注意力转向他上任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的格陵兰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讨论“一系列选项”以得到格陵兰岛，其中包括“动用美国军队”。

在外界分析特朗普政府为何如此垂涎格陵兰岛时，有两个关键词被频频提及。

其一，位置。“位置，位置，位置。”美联社连用3个“位置”解释特朗普为何如此想要格陵兰岛。

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部，是世界第一大岛。该岛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均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目前在格陵兰岛有一个军事基地。格陵兰岛战略位置重要，曾是冷战中美国对苏联核攻防战略的重要支点，也是北约反潜作战体系中“格陵兰—冰岛—英国缺口”的关键一环。

随着气候变暖，北冰洋的海冰加速融化，北极航道的商业潜力日益凸显，可以减少部分航运时间并绕开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等容易被阻断的传统航运要道。

尽管北冰洋的气候和海况依然恶劣，但按美联社的说法，特朗普显然希望通过控制格陵兰岛扼守从北大西洋和北冰洋通往北美的航道。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文章认为，对于两条北极航道，即沿着北美洲北部沿岸的西北航道和穿越北极点的中央航道，格陵兰岛处于关键位置。从长期看，格陵兰岛在预防和应对紧急情况等事务中意义重大。

其二，资源。“不可思议的自然资源。”美国副总统万斯如此“赞赏”格陵兰岛。

格陵兰岛富集稀土、石墨、铜、镍等能源转型、芯片制造的刚需资源。丹麦与格陵兰岛地质勘测所2023年发布的研究指出，格陵兰岛无冰区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拥有涵盖近40亿年地质演变过程的复杂地质构造，是寻找和开发各种矿产资源的理想之地。欧盟认定的34种关键矿产中，31种可以在格陵兰岛找到。美国地质调查局还判断格陵兰岛附近海域富含油气资源。

长期以来，格陵兰岛的矿产开发有限。截至2023年，格陵兰岛仅有两个正在运营的采矿项目。贝尔弗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的文章指出，随着格陵兰岛冰层和海冰融化，该岛及周边海域资源开采难度会逐渐降低。

正是资源，让美国一些人罔顾一切地着迷、痴迷、沉迷。

特朗普4日宣称，委内瑞拉可能不会是美国干预的最后一个国家，并称“我们绝对需要格陵兰岛”。对此，丹麦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和英国于6日还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格陵兰岛属于其人民，只有丹麦和格陵兰岛有权决定涉及其自身的事务。（据新华社电）

林昊

# 为了海里的它们

孙亚军

2026年1月17日，海洋保护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这一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以下简称《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正式生效，中国自即日起成为协定缔约国。

《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明确提出以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生物多样性为目标，希望通过保护海洋生态，引导各国深海远洋活动实现绿色转型，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赞该协定的出台“展示了多边主义的力量”，是海洋保护和多边主义的“历史性成就”。

海洋覆盖了地球表面的71%，公海



面积约占海洋总面积的70%，但目前只有1%的公海受到了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从制度层面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梅宏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首次为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建立了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整体性保护框架，在现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度基础上，矫正了该区域长期存在的治理碎片化和规则不足的问题。

“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建章立制，可

以说是重塑了现有的海洋秩序。”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施余兵告诉记者，《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建立了海洋遗传资源、划区管理工具、环境影响评价、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四大制度。比如，过去在公海区域捕鱼都是先到先得，大家拼的是“快准狠”；如果设立公海保护区，会有效约束过度捕捞行为。

在梅宏看来，《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旨在扭转“谁有技术、有资金资源就归谁”的旧局面，试图构建一个更公平的海洋保护体系，可被视作海洋生态保护的核心突破。

《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的成果来之不易。该协定由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历时19年谈判达成。已批准协定的国家分布广泛，既有法国、挪威、西班

牙等公海活动频繁的国家，也有卢森堡、马拉维等内陆国家。“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多边主义的极致考验，各方在许多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梅宏说。

梅宏认为，该协定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一是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即遵循综合治理思路，将海洋视为一个完整生态系统；二是从“单边行动”到“多边合作”，即强调集体决策，致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能力，推动全球海洋治理走向更公平、包容的方向；三是从“开发主导”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并重”，首次从法律上确立了在公海设立海洋保护区的程序。

“协定的达成是多边主义的重大胜利，中国在其间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施余兵表示，作为该协定政府间谈判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他见证了中国在谈判中积极承担大国责任，注重协调不同国家权益，关注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与一些国家推行的单边主义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积极参与该协定，不仅增强了参与国际规则塑造的影响力，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也将为中国发展海洋经济注入新动力。”梅宏说。

本版编辑 韩叙 王一伊 美编 王子莹  
来稿邮箱 gjb@jirbs.cn